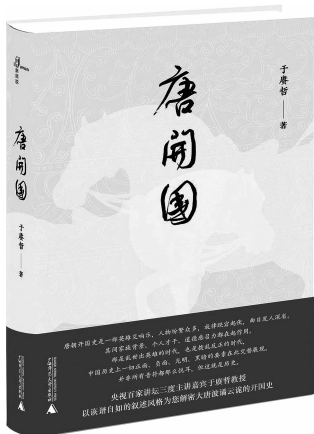


大唐王朝开国的真相

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但在故事的精彩程度上却并不输于一些相同题材的古典小说



《唐开国》
于震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关于唐代开国,民间流传最广的是《说唐全传》《隋唐演义》之类的说部,正是通过它们的传播,唐代开国的故事称得上妇孺皆知。但这些说部只是小说家言,距离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于震哲教授的《唐开国》是一部有着严谨考据和周密推演的通俗历史类读物,书中内容以典籍史料与考古遗迹的发掘互为佐证,在写作上则吸取了某些说部的写作手法,预留悬念,层层推进,所以它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但在故事的精彩程度上却并不输于一些相同题材的古典小说。

从总体上看,于震哲的《唐开国》采

取的是一种以战争讲述和人物描写双轨并行的写法——战争讲述主要以重大事件为线索,串联起唐代开国的全过程;人物描写主要是突出人物之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阐释他们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作者从贞观九年唐高祖李渊即将去世的日子开始写起,以李渊的目光回顾唐代开国之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政局稳定,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朝野风清气正,基本制度得以建立,基本精神得以塑造……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尽管他不知道死后自己的儿子会如何评价他;尽管他身后落寞,甚至完全被笼罩在被后人称作“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光环之下。

对于唐代开国的意义,于震哲大致归结为两点:“一般的意义:结束战乱,王朝走向稳定。特殊的意义:开启新型官僚政治,完成民族大融合,创造历史新局面。”他对战争的讲述也基本上围绕着这两个方面逐渐展开。于震哲认为,隋朝末年的社会动荡首先是与隋炀帝个人的缺陷分不开的,它无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隋朝国力富强,制度完备,隋朝之所以迅速走向灭亡,其实是隋炀帝过于超前的“改革”所致。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隋炀帝是一个昏庸无为的皇帝,事实上,隋炀帝自有过人之处,他认识到门阀势力对国家的危害,所以大量引进江南和关东人士,借以冲淡关陇集团的影响力;他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由北方转移到东南方,所以兴建洛阳城,开凿大运河……可以说这些举措都顺应了历史潮流,但隋炀帝身上有一些致命的弱点,比如好大喜功、生活奢靡,在执行方面往往分不清轻重缓急,终至民不聊生、众叛亲离,

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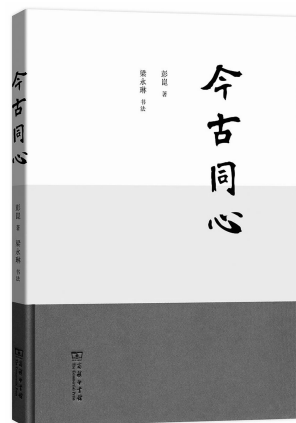
于震哲在战争讲述方面可圈可点,而他在人物描写方面也颇具特色。在于震哲笔下,李渊自然是唐代开国的核心人物得到重点刻画,围绕李渊的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魏征、刘元静、裴寂,乃至隋炀帝杨广、一代雄主窦建德、劲敌王世充、猛将尉迟敬德等人也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摹写。于震哲描写人物并不是简单地叙述生平经历,而是在性格刻画的基础上分析其成败,总结其得失。尤其对那些有争议的人物,于震哲既不因袭旧说,也不急于为他们翻案,而是利用现有的资料,尽量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比如,于震哲不仅以李渊为核心讲述唐代开国的过程,同时也以大量史实证明了李渊在唐代开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眼中的隋炀帝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雄才大略、具有极强的战略前瞻性的君主,隋炀帝的诸多举措都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于震哲将唐代开国的人物编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张人际关系网中每个人的不同作为,读者看到了一条唐代开国的清晰线索。

于震哲最后总结道:“唐朝建国战争是一次历史的纠偏,它摒弃了隋炀帝施政的种种弊端,继承了隋朝的种种优点,促成了唐朝盛世的到来。”于震哲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通俗历史书既可以忠于史实,也可以写得好看;如果说忠于史实是对一位历史写作者的基本要求,那么写得好则可以让更多的人对历史产生兴趣,进而让一些历史常识产生更加广泛、深入的影响。

王淼

穿越时空的诗意之旅

如何接受古典文化,获得生命的愉悦与境界的提升,是文化阅读的重要课题



《今古同心》
彭崑、梁永琳
商务印书馆 2018年11月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如何接受古典文化,把穿越迢迢时空的古典风雅的诗歌精神与诗意人生融入现代生活,获得生命的愉悦与境界的提升,这是文化阅读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北京有幸得识才女彭崑。彭崑祖籍江苏彭城,出生于中州,毕业于北师中文系,先后供职于中央音乐学院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她自幼受家庭文化影响研习音乐,主修钢琴,痴迷于古琴与古典诗词,旁耽文学写作,深爱书法艺术。诗词琴书之润下,彭崑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女性与女艺术家,打通了现代心灵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时空世界壁垒,以其女诗人的感性诗意的笔触,表达着她阅读古典诗词的心灵感受,以四十一篇诗帖,纵情舞蹈于中国诗词的古典文学世界里,在古诗的意境中,舞出了一个现代东方缪斯的神韵,这端的是文学接受美学的一个生动、经典之美之“诠释”与“创造”。

“千里江南,正飘着冬夜的雪,一片静寂,梅花初放……我想折一枝寄与你——我远方的知己,雪堆积,路迢递,雁书空寄,阵阵寒凉与无力,多少无奈,一身离愁……”这种彭崑现代散文诗的句式与表达,与千年前姜白石的词境遥相呼应,仿佛把《暗香》(旧时月色)的词境拉到了眼前,但与姜白石不同,这种笔下情调,不是姜白石的“春风词笔”,而是彭崑她自己的冬雪哀愁,离人情愫,伤怀骊歌,主题是知己难遇,知音难托。借古人之杯盏,浇的是自己的块垒,而让人叹服的是,虽是两种情怀,但在意境上,却又仿佛曲暗合,像是尺八与黑管,轻和着同样的旋律,异曲而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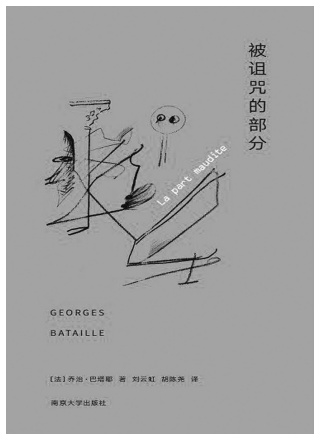
一个诗人在扬州十年一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一个词家为之赋词,一首慢词,写尽扬州的物华人事,历史沧桑,诗人身世。“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这种情怀因为一个“难诉”的意绪触发彭崑的情怀,于是她的新赋“为谁而生,为谁而赋”之诉,更显人生之“百年孤独”的现代人之在这个多元文化并存、急剧转型中所面临的精神世界与价值体系崩溃重建、知音难觅的痛苦。这种痛苦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出一辙。在这言语背后,亦如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说,“剖开这些文字,应有血流出来。”事实上,彭崑另有一篇便是解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同样的情感寄托,我理解彭崑为何三致其意,又选了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作心解,为的就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最难受说的心中之意,如情人之相思,国士之大志,有怀难展,有情难托!“一切都在空处”,一如鲁迅诗句所云,“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也。

彭崑有着很好的古典诗词修养,又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在这个大时代变局中所感受的时代之“悲欣交集”之痛、之甜、笑中带泪,泪中蕴蜜,如同恋爱中的痛苦之幸福,流泪之欢畅。这种情感极致,非痛哭过长夜之人所易知。这种情感又借古代诗词发之,古今同心,为天地一哭,也为天下多情之人一哭。只不过,这一哭,却是“长歌当哭”,用现代散文诗的诗意表达,发诸文字了,而这些文字,古意斑斓,辞令婉曲,曼为短调促句,实字字写着纸短情长、意在辞外,绕梁三日之音。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书法家梁永琳为彭崑的诗解配写了四十一帧书法,以书境呈诗境,为彭崑的文字作艺术的脚注,从而呈现别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的格调与情思。

陈子安

“夸富宴”背后的逻辑

不是马上偿还,而是稍后回报,这就是信用;如果回赠没有超过收取,就会没面子



《被诅咒的部分》
[法]乔治·巴塔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在《被诅咒的部分》里,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描述了美洲部落的一种习俗:首领将大量财富隆重赠予对手,目的在于羞辱、挑战并强迫他。受赠人若想消除羞辱、反抗挑战,就必须举办一次新的,更加慷慨的夸富宴来回应。

夸富宴在人类学文献中非常著名。最初关注这种现象并系统分析的哲学作品,是马塞尔·莫斯的《论馈赠》。莫斯指出,“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

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每个人都力争比别人给出的更多,成为这个竞赛的赢家,这种行为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之上:信用与荣誉。不是马上偿还,而是稍后回报,这就是信用;如果回赠没有超过收取,就会像咱中国人经常说的——没面子。

巴塔耶肯定了莫斯所意识到的伦理行为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言,不妨视之为在“礼”和“义”的基础上建构的共同社会生活。不过,巴塔耶主要是从普遍经济学角度去剖析夸富宴,而且,比起原初的建立联系,巴塔耶更关注当代社会对它的消解。

巴塔耶说,夸富宴是一种财富流通的方式,但它将议价排除在外。当双方的对立激化、各自轮番表明可以给出更多的时候,这种财富流通方式就造成了无限与有限的自相矛盾。那就不再是送出礼物了,而是要销毁、损坏那些珍贵的物品,以示自己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需求的奴仆。极端表现就是屠杀奴隶或献祭活人,通过把人“物品化”的方式作为炫耀。

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是“权力”的意志。赠予人在表面上损失了财产,但在受赠人消除由此产生的义务之前,两者实际上处于黑格尔所阐释的心理上的主奴位置。所以,巴塔耶说,夸富宴无法归结为对损失的欲求,它带给赠予人的不是报复性回赠中不可避免的财物增加,而是它给予最终获胜者的“地位”。

在乔治·巴塔耶生活的时代,下列事实为他的批判理论及其独特阐释提

供了根据:工业文明不合理的迅猛发展;生产与消费、增长与倒退之间的不协调;大国侵略扩张的野心;频繁的战事灾难;核威胁;剥削的加剧;阶层的分化;人口增长与环境负荷……所有这些都指向巴塔耶称之为“被诅咒的部分”,指向人与世界和谐关系的破坏。

这个世界不仅苦于匮乏与不满足,发达工业社会奇异而疯狂的一点,还在于无度的挥霍与无休止的消耗。巴塔耶认为,相对于生产,财富的“耗费”才是首要对象。“耗费”构成了这部论著的核心要点,也是作者深刻敏锐之所在。

从文化分析角度,巴塔耶以自然界的三种奢侈——吃、死亡和性生殖切入,指出地球生命史主要是疯狂的丰盛的结果,现代权力经由劳动和技术的扩张以及人的异化导致越来越密集的集中。财富的消耗加剧了斗争与破坏的维度。巴塔耶在论述中引入了印度的贫困问题。他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无法同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及其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比例失调分开,印度工业增长的可能性也无法与美国的资源过剩分开。巴塔耶的矛头还指向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他看来,国际局势的博弈也包含着“夸富宴”背后的逻辑,美国的经济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工业过剩的消耗,马歇尔计划就是一种解决方案。在本书的结束部分,巴塔耶从普遍经济学原理回归哲学探讨,就增长的这一从属关系,强调个体应当拥有自我意识,一种不再以任何物为目标意识。

林颐